

# 全球价值分工与两层级结构性再生产

吕程平,白亚丽<sup>①</sup>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00)

**[摘要]** 文章从全球技术—价值垄断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结构性再生产的内在发生机制,描述了以国际IT业为代表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内在权力因素以及其与劳动控制、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制度结合、造成特定的社会后果,及其对社会结构的重塑作用。这样的技术结构性分工体系,有着强烈的自我建构和复制能力。它通过对价值和社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向的把控,制约着社会群组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使位置属性具有了结构性循环的意味。在此,以技术的模块化垄断为内核的利润分享机制,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全球配置,实现了对人类可行能力全球配置。或者说,通过将低技能劳动力在个体生涯层面和代际上升层面的动态发展能力的闭锁,而形成了对一国在生产能力和价值分享机制上的闭锁。如果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视为一个巨型系统,其基本属性之一就是保持原有的构型——一种物质和能量的平衡状态。当内部某一单元出现偏离原有结构的趋向,其它组成部分会通过改变自身路径等方式,以关系性制约保持结构的完整性。这也就是“结构性再生产”的意义。

**[关键词]** 全球分工; 资本主义体系; 技术结构; 留守儿童; 结构性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2-0080-07

## 一 全球价值分工

按照全球价值链理论,全球分工的利润形成机制遵从微笑曲线原则,也就是说在产品的设计、核心技术处于掌控地位的企业,由于控制着高附加值的技术,往往决定着产业链的定价、品牌等领域处于主导地位;而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处于利润曲线的下端。进一步看,利润分配背后其实是权力的配置因素,也即在核心技术领域权。而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企业,依靠低技能劳动力进入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组装环节。其在全球定价机制中要想分一杯羹,依赖的是一种“竞贱”机制,也就是要不断在劳动力环节或非生产性环节压低成本,这就因此带来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劣势待遇。据估算,不管是在传统的服装生产部门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成为低技能劳动力聚集领域的微电子领域,处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组装领域的企业获取的产品价值低于10%。

传统上,将全球生产价值链区分为生产者驱动

型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前者强调对技术开发、核心部件掌控,以及依赖强大资本的生产体系的构建。后者则侧重于品牌经营、销售网络的运作。但近年来一些国际品牌已经打破了这种分野,以苹果公司为例,其一方面控制着旗下产品的关键部件,并以最大限度控制供货网络为出发点,通过强制性专利转让等形式,控制其供货链条;另一方面,则依靠从别具特色的外观设计到乔布斯的传奇故事,成功塑造了一种紧扣年轻消费者心理特征的品牌文化。

产业分工的不平等性有着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同样漫长的历史,即使在互联网经济和全球模块化生产风生水起的今天,这样的分工只是依托技术壁垒、专利壁垒和品牌壁垒,更加地复杂化和深刻化。可以说,产品内核技术的复杂化,为这样壁垒林立的全球分工体系提供了更多空间和可操作性。

据估算,依靠非核心部件组装的计算机类电子产品的平均利润率仅为5%左右,而如果掌握操作系统、芯片等核心技能,则可能达到50%的利润率<sup>[1]</sup>。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是,这样分工体系具有马太效应式的自我复制能力。由于不管是生产性垄

**[收稿日期]** 2017-02-22

**[基金项目]**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伴你飞翔项目组、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联合调研项目“广东沿海地区制造业职工素养调研项目”资助(编号:15YZS051)

**[作者简介]** 吕程平(1981-),男,北京怀柔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

<sup>①</sup>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项目总监。

断还是品牌型垄断,从经济资本、技术资本乃至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其背后都是依赖着发达经济体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技术优势、科研优势和商业文化优势,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去突破这样的壁垒,则利润仍会沿着既有的轨道流动。

这里其实也揭示出作为现代经济学根基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根据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理论,后发国家应在每个发展阶段,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品和技术。在早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资本积累,随着劳动—资本资源禀赋的转换,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sup>[2]</sup>。问题是,这个过程是否真能自然发生。这里忽视了世界分工中权力和垄断因素。在技术发达国家,技术垄断企业的要求上升为国家意志,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高技术出口限制和技术标准等形式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强化其统治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留给后发国家的选择有多少?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可以看作是“三来一补”的极限,其实质是一种以低端劳动力为自诩的比较优势的陷阱,诚如在治理失败国家,自然资源的丰腴却往往引致更深的苦难。日韩等以大企业集团为依托的起飞阶段发展策略,恰恰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反论。正如我们将在本文中看到的,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通过不断地以教育缺失等方式保持着自我复制倾向,从而形成一种结构的固化。

在一份针对 APPLE IPHONE3G 主要零部件供货商和单位成本的数据中,在苹果公司每一台 IPHONE 手机中,依靠庞大的低技能劳动力开展的终端外包、组装环节只获得不到 2% 的利润,而苹果公司依赖品牌营销、产品设计、核心技术控制了近 60% 的利润。剩余的中间地带,则被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欧洲企业依靠部件开发优势分享。其中,日本东芝公司的显示模块、触屏等技术占据近 60 美元的成本。韩国三星公司通过应用处理器和同步动态随机存储装置等技术,占据 23 美元的成本。德国英飞凌公司(INFINEON)通信技术、射频发射装置等占据了近 30 美元的利润。这样在一部生产成本为 179 美元的苹果手机中,在中国进行的集合了大量青年劳动力的组装程序只占了 6.5 美元的成本。正如有评论指出的,在整个苹果产业链中,中国几乎没做什么(China Makes Almost Nothing Out of Apple's iPads and iPhones)<sup>[3]</sup>。在这里“几乎没做什么”是指,虽然承担了巨大的环境和劳工损害上的成本,但在产品附加值上的贡献却相当微弱。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我国高端制造业取

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广泛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外贸加工企业,仍是主要在技术低端依靠长时间加班、压低劳工权益和巨大的环境代价分得微薄利润。要真正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进步,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所谓“全球中国制造”的终端出口统计中包含了来自太平洋两岸(指美、日等国)的低可替代性技术成份,而这种不以模块内技术能力累积和可持续内在制度构建为指向的去内涵的 GDP 追求,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无发展的增长。

这里其实展示了全球外包体制与产品技术等级体系的重合。可以将技术体系支撑的产品应用视为由核心技术和若干支撑技术的有序组合。而占据高附加的企业,就是通过对核心技术的开发与控制,通过对品牌市场的设计与操作,达到对特定产品乃至行业的控制,主导部件定价权的谈判机制,并通过制定产品技术标准,主导整个产业链的生产动向,从而决定产业链的构成与利益分配机制。而在技术体系与利润分配机制中间的过渡环节,就是价值创造过程。

信息技术革命以来,可以将产品视为复杂性系统的模块化建构过程。以接触界面标准化、低成本聚合性为特征的现代模块化生产,本身也是自组织的分体系以通用语言的聚合体。在模块化分工的时代,对整个复杂性系统通用语言和规则的设定、开发、调试,对资本、科研实力有着巨大的需求。而一旦作为整个体系“内在序”的通用规则得以确立,并完成对对整个体系模型的生产,企业也就完成了对价值链的绝对控制权。

此时,拥有雄厚资本和技术实力的元开发企业就可以根据利润有利原则自主选择产品模块的分配方式。其中一种较为通行的方式是,元开发企业仅负责对整个模块系统内在序的持续地再创新,这就如同牢牢抓住了一个生命体的基因序列。以通用信息序列和标准化交接界面为基础的企业间契约关系,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使得各个功能模块的生产环节可以自由地在全球各地切换。可以说,地理因素在成本方面的特殊性,已经让位于其在市场便宜程度、廉价劳动力可获得程度等因素。而处于元开发地位的企业,特别注意发现、甚至培养多个功能模块生产供应商,通过降低各个供应商的不可替代性,增加各个分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性,防止供应商通过对某一部分模块技术的绝对控制,而增强自身在整个利润分配中的议价能力。这种在分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对于元开发企业来讲,因其是在非核心技术环节展开,而具有完全的可控性。元开发企业通

过其对元序列和各个模块之间标准化交接语言的控制,也就持续保持着处于同业竞争处境的分包企业对其的依赖性。

## 二 第一层级结构性再生产:模块闭锁与比较优势失效

现有的讨论常把系统模块化生产视为“水平化”或“网络化”的分工,从而与大机器时代的企业内垂直分工相区别。然而正如以上展示的,“水平化”的描述中对跨国生产中“权力与控制”因素的忽略,带来一种“世界是平的”般的错觉。虽然不能否认各个功能模块的生产者对本环节的价值过程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这样的自主性实在是依据既定的通行信息序列、并在元开发企业的授权下进行的。模块化生产模式的各个分模块的利润空间界限也是受制于由模块系统各个功能层级的基本分配格局。

元开发企业,作为拥有信息、技术和资本优势的强势集团,需要持续保持对关键模块的掌控地位,从而从跨国价值链中把持垄断利润。这就需要其对关键价值模块进行不断的升级和创新。并以突破性创新保有对潜在竞争对象的代际差距。其实,切分与垄断一直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利润控制的基本方式。早期家庭手工业的消失与成熟的商业资本对手工劳动者与需求市民之间的联系隔断有关。而在当代高度复杂化的分工体系中,在从设计到制造诸环节,再到营销与流通,每个分组都内涵着特定的区隔信息块。这样的信息既包括以技术专利、技术标准等可编码知识,也包括市场偏好、公关网络、工艺理念等默会形式存在。这样的浓缩信息块构成了垄断企业极端的核心竞争力,并决定着其根本盈利模式。

如果说,工业史的中前期,后发国家还可能通过先期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环节作为切入口,来进入分工体系,并积累资本,而逐渐完成技术革新与升级,进而逐渐向价值链的高端前行,成为比较优势原理产生的历史逻辑。则这里的更深层级的命题,作为比较优势原理所依赖的现实基础已经在技术层次上丧失。

走在阳光灿烂的加州硅谷,已经很难想象这里与160年前马克思笔下的那个烟熏火燎的工业革命有任何联系。然而,当初这位青年作者笔下的分工体系,仍以某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塑造着世界的秩序:“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品,迫使这些市场转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一种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国际分工,使得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

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一份关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处地位的文献指出,2000年—2008年,中国出口中,国内价值增值比例有显著的下降,从78.8%下降到66.7%。另一方面,反映对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的国外价值增值部分,在这9年间,却从21.2%提升到33.3%。研究显示,在代表着当代先进制造业基本面貌的装备制造、先进微电子等领域,中国明显处于低端地位。由中国依赖廉价劳动力参与终端组装环节的进出口价值的对比中,其实包含着大量由跨国企业控制的核心技术带来的中间环节的价值增值。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依托,依靠低技能劳动力进入的全球价值链的装备制造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基本闭锁在一种低技能劳动力陷阱中。在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2007年的出口值中,有88.3%是加工出口,而其中就有93.4%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sup>[4]</sup>。

这得益于消费电子技术的特性,其核心部件控制着关键功能并能十分方便地实现高端技术闭锁,而各配件间的链接界面高度标准化、模式化及低干扰性,形成了强烈的组装环节可替代性。一方面,掌握核心设计技术的产业上端,因其可以轻松地更换组装提供商,而握有绝对的命令权。这种权力超越了对技术信息指令本身。在EMS(电子外包式产业系统)生产中,每个动作、每个工序、每个指令、每次流水线速度的提升,都渗透着上游企业最大化市场效果的追求。正如简·哈代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富士康的手机组装流程)在一系列重复性动作进行分工的基础上,几乎不存在进行任何智力活动的空间,因为这会动摇这一模式的根基。”另一方面,如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低端代工企业无法通过部件装配的积累,获取高端技术优势,只能通过不断削减劳动力成本和更加严酷的管理提高生产率,获得订单。

比较优势原理在特定领域的失效,展现了该理论内在对经济网络中控制—权力因素的忽视。这样的情形在日益模块化的IT开发领域就更为明显,一方面,对开发企业通过对模块核心序的调整、“突破性创新”,在不确定的时间间隔内推出在功能体验上的新款设计。而这样在设计层面的推陈出新,有一种不断向下的成本放大的趋势。一个微小的技术改进,往往给低端制造企业带来巨大设备调整压力。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达到了一种吸收生产环节利润存储的效果,从而制约其利用资本聚集而向上演进的可能。而在流通领域,这种成本逐级压大的策略是通过掌控者终端市场信息和销售网络的企业,通过操作订单、转移库存成本等方式,增加低端制造

企业在固定资本方面的投入<sup>[5]</sup>。

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本土进行的合资研发型企业中,这样的控制—依附机制仍是广泛存在。跨国集团通过技术协议、共同开发合同等方式,掌控外围研发机构所能接触到技术的范围、层级和质量。在这样的企业中,控资比重被严格执行,又通过种种“内部要求”限制本土开发人员与元开发企业的核心研发团队的接触,防止有关工艺、流程、开发技巧等隐性知识的流失。又以定向输出等方式,将外围开发企业技术产品出口的路径扎死,明确其只能将技术产品卖给母公司<sup>[6]</sup>。而对于那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优秀本土技术开拓型企业,跨国集团借助其强大的资本渠道和对国际资产购置规则的熟稔,动用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段力图将其收入囊中才善罢甘休。以比较优势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强调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不作为,是防止“要素价格扭曲”的第一要务。但在保护本国企业竞争和利润优势的博弈中,发达国家政府绝不会视垄断集团的请求于不顾的。当核心企业企图斩断后发国家本土企业技术上升渠道的努力不能完全奏效时,以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为代表的游说和施压集团就开始出马了,动辄以违反某某“贸易规则”、“技术协议”为借口,威胁或实质采取各种形式的制裁、封堵。一般来讲,在发达国家政企联盟公文包中所有工具用尽之前,在这场不均衡博弈中明显处于弱势的后发国家企业早已就范了。

这里是本文提出的结构性再生产的第一层含义,即其对于后发国家外围企业的产业链价值闭锁效果。也就是将后发国家视为低端产业链的层级上升困境视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结构性再生产的产物,认为从技术壁垒到可行能力的闭锁,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产业结构的自我复制和维持。

### 三 留守儿童:作为第二层级结构化再生产

对于留守儿童成因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研究者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归因于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问题,认为农民工子女的留守化或流动化,是因为无法获得与城市人口平等教育权利,而这背后则是户籍制度的二元划分。另一部分研究则把留守儿童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农民工流动性强、收入水平低等原因。这类研究并没有进一步揭示城镇化落后、农民工条件差这类现象背后原因,而是在倡导政策的适应性、包容性上止步。而本文恰恰是从这里提出问题,将研究焦点对准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及参与其中低端产业工人,探讨结构性

闭锁对特定产业及其从业人员产生的影响,进而从劳动力再生产角度看待留守儿童问题。如果生产力的结构分布制约着跨越全球的阶层分布状况,则是否可以从全球生产链价值体系出发,考察深陷于其中,并依附其存在的特定国家社会现实?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由于加工贸易中的关键组件来自国外,国内工厂只进行低技术含量的组装工作,在加工贸易型出口对国内增加值的拉动作用远低于一般贸易的拉动。每1000美元加工贸易出口对国内增加值的拉动仅为386美元,比一般贸易的拉动作用低51.2%。2012年加工贸易在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中占比为42.1%,但其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只占货物出口拉动国内增加值的26.2%<sup>[7]</sup>。

这也就意味着包含在产品增加值内的直接劳动成本处于相对低水平。与产业高端环节在发达国家本土进行相对应的是,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线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同时,这也是社会成本的转移。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并没有如发达经济的劳动保障传统和实际发挥作用的工会组织。也就因此形成了难得的人力资本(简单肢体技能型的)价格低地。去在地化的代工企业,可以为了获得劳动力低地,将装配线搬到全球任何地方,也就没有必要承担对待普通装配线工人的长远生计保障责任。事实上,在诸多有关电子代工制度的技术文献中,组装线上的劳动力常常成为整个叙述中可以被忽视的因素。同样被遗忘的还有,具有更深远影响的社会成本。我们这里将研究的焦点聚集于与国际分工体系有着紧密联系的消费型电子外包产业。

在消费型电子外包产业漫长的生产线的各端,对参与其中的、处于不同地位的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呈现极化的趋势。如果说在其设计、研发领域(通常位于美日欧),强调个体的创造力、想象力是对人类思维自由极致的挑战。那么,在技术的末端,则要紧的是成本控制能力、快速应对(能力)和劳动力强制动员能力,它要求个体——年轻的身体某一部分的极致精巧和精确动作,所有神经元都要为这样的精确动作服务,任何其它的想法和能力都是多余的,应被扼杀的。这两种极端的人类智能倾向汇聚于同一条隐性的生产线的两端,汇聚在同一只华丽的“苹果”内部。

基于技术垄断的分工,不断地再生产着自我维持的社会结构。各个层级的劳动者依附于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上。而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是来自腹地农村的低技能青年们,在这个环节上,动作与思维、体力与脑力、情感与生存的彻底分裂达到了极致,从

而要以生命终结的形式达到个体极端异化的终结。不仅如此,这还是一种基于对个体及世代可行能力的剥夺。这里我借用的是阿玛蒂亚·森的概念,从这个概念出发能看到一种更深层次也更隐蔽的剥夺。在之前的研究中,笔者指出以电子代工企业代表的低端组装制造业通过劳动过程管理、宿舍体制以及与城市其它功能区的半分割状态,在事实上构筑了一个对青年工人可行能力发展水平壁垒。在这个由与无形的全球分工体制与有形的地理区位、周边设施共同形构的壁垒中,工人不仅在工作期间难以获得对于自身长久职业发展必须的更高层次的技能训练,即使在休憩时空,也由于自我培训、教育设施、信息的低可获得性,而难以完成劳动力向更高水平的进展。

根据由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伴你飞翔项目组、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and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推进的广东沿海地区制造业职工素养调研(以下简称广东制造业职工素养调查)<sup>①</sup>,超过30%的一线普工反映,“从来没有做过技能培训”,这个比率在技工中也有近15%的比重。而现有技能培训不仅在很多企业并没有形成规律,且间隔时间较长,有超过25%的质量、技术部门员工表示,技能培训的间隔超过一年。调查发现,企业员工流动性相当大,在不区分工种的统计中,有36%的员工,换过超过3份工作(包含3份),21%的员工换过2份工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员工表示尚“没换过工作”。这就直接导致员工对企业归属感较低,且难以形成技能积累。

另一方面,调查显示,生产一线的职工对未来的看法,“迷茫”则成为关键词。只有7%的员工明确表示会将家安放在城市,一直在工厂做下去。14%的一线工人,对未来“迷茫,不知道以后怎样”。另有超过20%的员工计划将来还要回老家,而将近半数的员工,则对未来没有明确预期,“没想过、看家里情况”。

广东制造业职工素养调查发现,有相当部分的员工有通过自学提高技能水平的意愿。但其中大部分或者“根本不知道应该学些什么”或者“由于时间或精力的原因没能实行”。有12%的员工曾经学过某项技能,但中途放弃。只有7%的员工一直在尝试学习某项新技能。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呢?调查显示,工业园的工作制为两班倒。一般为白班早7点到晚7点,夜班晚7点到早7点;白班和夜班交替各持续一个月。上夜班回来的工友的生活就是:早8点钟回到宿舍,睡到下午4、5点,收拾一下,吃完饭,去工厂上班,如此往复。从此次调查工友提供

的数据看,在之前的一个月他们平均工作26天,一个月休息两天甚至一天都没有休息的不在少数。这样的时间安排能给工人学习新的技能留下多少时间呢?而加之,她们所在的整个生活区域(工厂—宿舍—购物区)中,基本没有提供学习进修机会的设置,这样的接触性限制和信息的缺乏共同构筑了一个普通工友很难突破的空间。

这里实际上体现了两个层面的可行能力的闭锁机制,即对青年工人个体在生涯内发展能力的闭锁,以及通过对留守儿童发展环境的制约形成对劳动力代际间向上可能性的闭锁。一方面,体力与脑力的极度分割,给青年造成智识乃至发展能力及其生计想象上的深度伤害。另一方面,与当地社会在空间、文化上割裂的集体宿舍制度和微薄的薪水,不足以支撑青年在城市的完整家庭生活循环的维系,这不仅仅让所谓的城镇化政策徒有其名。同时,大量留守儿童心理和教养问题的报告更是显现出扭曲的技术—劳动制度对民族未来能力和前景的巨大隐患。特别是,当将这样的劳工可行能力闭锁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邻国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面向职工可持续能力提升和技能积累的长期雇佣和培训制度相比较时,这样的隐忧则更为明显<sup>②</sup>。

据一项2011年进行的针对富士康在华企业,工人生产待遇的调查报告显示,73%的流水线工人日平均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而大致同样比例的工人约平均休假时间为4天。高强度、高重复性、军事化管理给全球精致电子消费品生产线上的年轻工人带来了包括紧张、月经不调等肉体和精神上的困扰。在一些环节,每个工人被要求2秒钟完成一个动作,每天要进行2万个重复性动作。工资方面,在富士康因接连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而应允增加工资的背景下,普工岗平均工资为1733.6元。

如此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在两方面对青年工人后代的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带来影响。一方面,低工资水平在维持工人自身生计之外,很难支撑完整的城市家庭生活。在对青年工人的访谈中,24岁左右对于占据电子组装流水线绝大部分的女工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节点。随着肢体技能最佳年龄逐渐逝去和成家压力越来越大,女工们面临着继续留在城市还是回腹地老家的选择。她们中的大部分将返回农村,在那里完婚,并在若干年后留下已经可以留给父辈拉扯的孩子,再次返回工厂。根据广东制造业职工素养调查,有51.2%的打工者之前有过不同程度的留守经历,而对于其中已有子女者,仅有约22%的人目前能和孩子生活在一起<sup>③</sup>。这也就意

味着,新一代打工群体仍旧重复着与父辈一样的、独自外出打工、将年幼子女放在家中的经历。或者说,将自己童年的经历重复在自己儿女身上。

既有研究指出,家长外出打工将给儿童从身体健康到性格发育,乃至个体发展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根据段成荣、吕利丹等通过对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在适龄儿童中,只有20.3%的留守儿童

(16岁)正在接受高中教育。在完成初中学历后,留守儿童在校比例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15-17岁留守儿童读高中比例(37.3%)比同年龄段非留守儿童低12%。有留守经历的农村青年,不仅更可能较早地外出打工,也因为受教育水平低等原因,面临更低的收入水平<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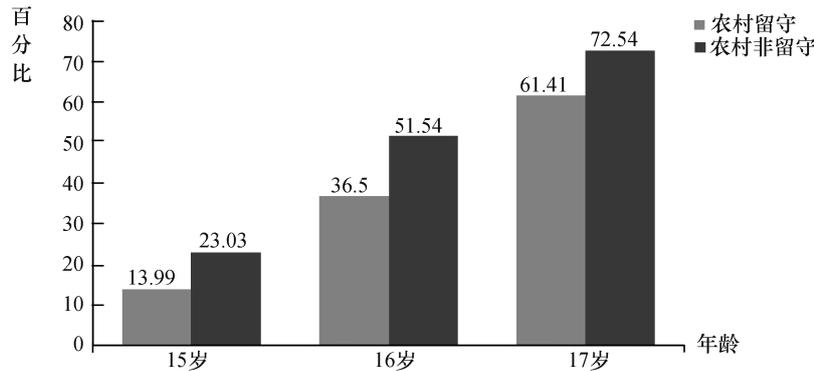


图1 2010年全国适龄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读高中情况(比例:%)

数据来源:吕利丹.从“留守儿童”到“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学业终止及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14(1):37-50.

换句话说,与父辈低端劳动力就业相关的中国留守儿童现象一样,因为父母的高流动性、辅导不足、健康失调等原因,而使其在个人学业上面临更大困境,也就更早、也更容易再次进入低端生产环节,从而形成了一种结构的自我维持。而这种低水平自我循环的结构,从劳动力素养层面形成了一种“低质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固化,强化了一国在全球技术—价值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在此,以技术的模块化垄断为内核的利润分享机制,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全球配置,实现了对人类可行能力全球配置。或者说,通过将低技能劳动力在个体生涯层面和代际上升层面的动态发展能力的闭锁,而形成了对一国在生产能力和价值分享机制上的闭锁。当然,这种闭锁通过静态化的比较优势理论得到合理性支撑。

这里,可以更清楚地辨识出本文提出的“结构性再生产”的意义。如果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视为一个巨型系统,其基本属性之一就是保持原有的构型——一种物质和能量的平衡状态。当内部某一单元出现偏离原有结构的趋向,其它组成部分会通过改变自身路径等方式,以关系性制约保持结构的完整性。由于这样的结构化建构本身是在熵的意义上违反均衡异质分布的热力学原理,因而就需要对外界能量的不断注入——诚如资本主义体系的维持需要以持久的利润追求为要务,因而利润不平衡原则

内在性根源于体系维持的必须。在这里,笔者无意强调某种人格化的阴谋论。相反,如此对个体生涯可行能力及代际间发展空间的闭锁,以及结构的自我循环和强化恰恰是去人格化的自发机制。这种自发机制根植于系统对自身层级结构的维持属性,是一种物质—能量相对平衡的耗散结构维持的特征<sup>④</sup>。

从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分工角度观察留守儿童问题,可以想见单纯从教育和心理辅导方向探讨留守儿童问题的化解,很大程度上是个伪命题。当显示一国综合实力的装备制造的核心技术模块不可避免地依赖进口;当依靠贴牌生产进入全球产业分包体系的在庞大跨国集团掌控定价权下,只能分取微薄的利润空间;当以巨大环境和人力代价获取的经济增值,没能以包括普惠型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等国民福利形式反馈给普通民众,从而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带动城镇化进程,而是在以因关键技术独占而获取的高额利润、金融霸权等形式流向大洋彼岸,在这样的背景中,外包产业链工人综合境遇改善、有内涵的城镇化、国富抑或民富等新近被泛泛提及的话题,早已经跨越了一国的边界。而与一条跨越美国西海岸的苹果、思科等高科技总部、日本东京湾沿岸的微电子聚集区,乃至广泛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并逐渐向内陆深入的低技能劳动力总装工厂的漫长的

生产线的运转有着紧密关联。

#### 四 总结与研究意义

从我国现阶段来看,新一轮的技术革新正在展开,沿海原有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正在迅速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方向转型,沿海地区庞大的“机器人换人”计划正渐次展开。同时,《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要做到真正“以人为本”的创新驱动战略,就需要立足我国劳动力构成现状,推进有利于提升劳动者整体职业技能素养和可行发展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保持社会面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考量不同生产技术设计在生产性和社会性上的后果,在不同技术选项中做出抉择,是政策界和学界亟待解决的课题<sup>[9]</sup>。在这方面,本文从全球化生产体系角度,深入考察技术选择过程中,面向技术革新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对于现阶段科技和经济政策制定有着启发意义。

#### 注释:

①参与调研的行业涉及深圳、东莞、中山等地玩具、电子、服装、五金等行业,包括普工、技术工、质检、工程师等生产类别,共回收有效问卷416份。

②近期学界才逐渐认识到日本长久以来的“物作”文化和“职人”精神,这是一种追求制造品质精益求精,在技术上不断磨砺的职业尊重,更在生产过程中体现为小组讨论、参与式技术改进等形式,表现为技术增进、企业进步与个体发展的统一过程。

③此部分内容得益于长期在东莞一代参与劳工服务志

愿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深挚感谢。访谈编号20150206;与工友辅助机构长期工作人员秦某电话访谈。

④关于耗散结构理论见:[http://press.anu.edu.au//info\\_systems/mobile\\_devices/ch11s08.html](http://press.anu.edu.au//info_systems/mobile_devices/ch11s08.html)。

#### [参考文献]

- [1] 商务部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14年)[R].(2015-06-28)[2016-11-18].商务部网站.<http://data.mofcom.gov.cn/channel/zhsj/zhsj.shtml>.
- [2]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9.
- [3] Kenneth L kraemer, Greg Linden, Jason Dedrick. 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 Apple's IPAD and Iphone [J]. *Brooking Paper Economic Activity*, 2008(6): 110-126.
- [4] 王岚.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J].*统计研究*,2014(5):17-23.
- [5] 袁俊.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与企业科技创新[J].*机电设备:市场版*,2005(4):28.
- [6] 李文东.全球化中的技术垄断[J].*经济研究参考*,2004(87):38-39.
- [7] 吕程平,白亚丽.产业增加值、技术能力与中国城市化[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7):58-61.
- [8] 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王宗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3(3):37-49.
- [9] 吴金明,吴双.产品价值构成、工业化演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22-34.

## The Division of Global Value and the Two Level Structural Reproduction

LV Cheng-ping, BAI Ya-li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technology-value monopoly, the paper explain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apitalism structural reproduction, describes the inner power factor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with the international IT industry as the representative, and the labor contro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benefit distribu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ause of social consequences, and remodeling of social structure. Such a technical system of structural division of labor, has a strong ability of self-construction and replication. It controls the social group'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through the control of the value and social resources in the global scope. In this paper, the technology of modular monopoly as the core of the profit sharing mechanism, through the global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achieves the global allocation of human viability. In other words, by blocking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ability of low skilled labor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career and the rising level of generation, it has formed a lock in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value sharing mechanism. If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is considered as a giant system, one of its basic attributes is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configuration—a balance of matter and energy. When a certain unit of the interior appears to deviate from the trend of the original structure, the other components will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structure by changing its own path and so on. This is the meaning of “structural reproduction”.

**Key words:**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capitalist system; technical structure; left behind children; structural reproduction